

清代农书观念的萎缩

——以清代藏书目为核心的分析

杨培元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农学著作自然层出不穷。清代的农书创作热潮尤为甚也,体量巨大且门类繁多,占历代总数的六成以上。然而,在农书创作的繁荣景象下,清代的农书观却较前朝有所收缩。自宋以来,古人的农书观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一些具有休闲性、观赏性的花茶谱录等方面的撰著皆可纳入农家的范畴。然至有清一代,诸此“触类旁及”的著作均被“逐类汰除”,无论官修或私修书目,均强调农书所涉内容的实用性,将收录范围严格限定在与衣食原料直接相关的农桑知识以内。清人农书观转向严格实用,是在实学思潮、人口压力、经济效益、华夷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成的。

【关键词】农书观;官修书目;私修书目;农桑知识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6-0029-09

The Contraction of the Concept of Agricultural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An Analysis Centered on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Qing Dynasty

YANG Peiyuan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In a country like China, where agriculture is the mainstay, agricultural works naturally proliferate. The boom in the creation of agricultural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particularly great, with a huge volume and a wide variety of categories,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60% of the total number of books written in previous dynasties. However, under the prosperous scene of agricultural books, the view of agricultural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shrank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dynasty. Since the Song Dynasty, the ancient concept of agriculture has a tendency to expand, some of the leisure, ornamental flowers and tea genealogy and other writings can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agriculturalist. However, in the Qing dynasty, these writings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were deleted, and both official and private bibliographies emphasized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content covered by agricultural books, and strictly limited the scope of inclusion to agricultural sang knowledge directly related to clothing and food raw materials. The shift of the Qing people's view of agricultural books to practicality was brought about by the combined action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practical thought, population pressure, economic benefits, and Huayi concept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book view; official bibliography; private bibliography; knowledge of farming and sericulture

[收稿日期] 2023-0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0&ZD218)

[作者简介] 杨培元(1994-),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俗学、农业史。

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历代王朝无不以农业部门为立国之根基。中国的先民们历经长期生产实践而积累了丰富的农学知识,这些知识以农书为载体,并以图、文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古人撰写农书的历史悠久,早在先秦两汉时期便已有农学著述出现,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中国传统农学不断发展,诸类农学著述层出不穷。有清一代,自满族入主中原至溥仪宣告退位,诸多错综交织的社会经济因素促成了该时期农书创作的繁荣景象。据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所载,仅明清两代的农书数量就占据了历代农书总和的六成以上,“到了清末农书不仅数量大、门类多、内容多,而且地区性、专业性、中小型农书已广泛流行”^①。

农书首次见于现代学术视野中,是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晚清知识阶层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思潮,在此背景下,上海农学会创办《农学报》,该报在发表效法西方的农学译著之外,亦刊登中国的传统农书,迄至今日,国内知识界对于农书的关注已百年有余^②。当然,晚清学者对于农学知识的重视并不代表关于农书的研究就此启动。据葛小寒考察,20世纪二十年代,农书研究在起步阶段以文献学范式为主;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其重心向“科学技术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式迁移;近年来又有学者从“知识史”的研究视角对传统农书提出新的见解^③。目前来看,从“观念史”的角度考察古人对农书认识的研究并不算多,其中,葛小寒与邱志诚的论文较具有代表性。葛小寒以史志书目与馆阁书目为依据,认为唐宋时期官、私立场的农学观念转变的大趋势是由对立走向了融合^④。在另一篇探讨明代农书观的文章中,葛小寒动用了书目、文集、农书三种类型的史料,论证了明人农学观念的多元性^⑤。邱志诚在分析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及传播问题时,首先对宋代的农书观进行考辨,他亦从目录学的角度入手,对宋代农书的范围进行了界定^⑥。综上,二位学者对于宋、明两代农书观的考察仍停留在表象呈现的层面,均未结合具体时代语境分析其成因。故此,本文从“观念史”的视角出发,在考察清人农书观念的基础上,进而检讨清人农书观形成的主要动因。

一、清代藏书目所见农书观

文献目录一向被认为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学术门径,章学诚将目录学高度归纳为八个字,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⑦,王鸣盛亦强调“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⑧。因此,若要窥探有清一代的农书观念,考察清代的书目乃是一条必经之路。古代并无农书专目,而史志目录为其提供了容身之所。广义的农书即可理解为农家之书,《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云:“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⑨由此可见,“农家”是诸子百家中最古老的代表之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与农相关的一个知识流派。故此,历代的史志目录部下均设有农家,专门收录与农有关的著作。农家书目始见于《汉志》,在汉代人的观念里,农大概是“辟土殖谷”的耕种活动。据王毓瑚考证,《汉志》农家类目下凡所

① 王达:《中国明清时期农书总目》,《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

② 邱志诚:《文献学、农学、历史学:百年传统农书研究的范式转移与反思》,《阅江学刊》2022年第3期。

③ 葛小寒:《文献、史料与知识——古农书研究的范式及其转向》,《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

④ 葛小寒:《唐北宋官修书目所见农书观》,《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2期;《南宋官私书目所见农书观》,《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

⑤ 葛小寒:《明代的多元农书观》,《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⑥ 邱志诚:《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及其传播方式》,《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⑦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卷1,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⑧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100卷,卷1,清乾隆五十二年洞泾草堂刻本,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⑨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三十 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第1742页。

著录农书皆与农耕技术相关^①。《隋书·经籍志》虽收时令、种植、畜养等方面的书籍,但本质上仍不出“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者也”的范畴^②。此后的史志书目对于农书范围的界定有所扩大。《旧唐书·经籍志》虽将农家定义为“纪播种种艺”,但其农家类目所收农书已涉及耕种活动以外的动物外形等内容,如《相鹤经》《相牛经》《相贝经》^③。《新唐书·艺文志》又增园艺著作《园庭草木疏》《金谷园记》入农家类目^④。《宋史·艺文志》所收农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大量谱、录、经皆进入农家,其中包括《花谱》《芍药谱》甚至《香谱》《酒谱》等与耕种无关的书籍^⑤。

明清之际,在藏书家钱谦益所撰书目中,仍能见到这种较为宽泛的农书认识。《绛云楼书目》成书于顺治初年(17世纪50年代),其中所收录的农书种类甚杂,收纳了诸多谱、录、经等类型的书籍(表1)。

表1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农家”所收书籍^⑥

夏小正戴氏传	齐民要术	荆楚岁时记	便民图纂	昭明太子十二篇
救荒活民补遗	救荒本草	种树书	岁华纪丽	探春记
易牙遗言	茹草编	质龟论	膳夫经手录	元李鹏飞集
岁时乐事杂占	四时气候解	云林堂饮食制度	农桑辑要	多能鄙事
酒经	树艺篇	分门琐碎录	菊谱	华夷草木鸟兽考
兰谱奥法	农桑撮要	闲居漫记	王氏农书	禽虫述
月令通纂	养生类纂	养生月览	三元延素数书	宋周守忠集
春秋繁露求雨止雨解				

上表可见,钱氏书目“农家”所收书籍范围仍较为宽泛,草木之属(如《华夷草木鸟兽考》《兰谱奥法》),禽虫之流(如《质龟论》《禽虫述》),饮膳之事,甚或是名人传记皆可纳入农书的范畴。在这37部著作中,以讲述农桑生产内容为主的撰述屈指可数,有《王氏农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桑撮要》《种树书》这5部,仅占总数的13%,即便是加上《救荒本草活民补遗》《救荒本草》《茹草编》《春秋繁露求雨止雨解》《岁时乐事杂占》《四时气候杂占》这6部讲述救荒、气候的书籍,亦不及总书目的三分之一。

钱谦益祖孙钱曾所撰《述古堂书目》成书于康熙八年(1669),该书目所呈现出来的农书观已大不相同(表2)。

表2 钱曾《述古堂书目》“农家”所收录农书^⑦

贾思勰齐民要术10卷	农桑辑要7卷	农书1卷
蚕书1卷	耕织图1卷	便民图纂16卷
树艺篇6卷	种树书1卷	田家五行2卷
岁时乐事1卷	吴社编1卷	岁事杂占1卷
栽培圃史1卷	求雨止雨节解1卷	捕蝗箕箒法1卷

① 参见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1至14页。

② [唐]魏徵、[唐]令狐德棻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隋书·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九 经籍三》,中华书局,1973年,第1版,第1010页。

③ 参见[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旧唐书·卷四十七 志第二十七 经籍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2035页。

④ 参见[宋]欧阳修、[宋]宋祁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新唐书·卷五十九 志第四十九 艺文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1539页。

⑤ 参见[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宋史·卷二百五 志第一百五十八 艺文四》,中华书局,1985年,第1版,第5206、5207页。

⑥ [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4卷,卷2农家,清道光至光绪间广州伍氏刻粤雅堂丛书汇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⑦ [清]钱曾:《述古堂藏书目》10卷,卷6农家,清道光至光绪间广州伍氏刻粤雅堂丛书汇印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

相较于《绛云楼书目》,《述古堂书目》“农家”的收录范围已明显缩减。钱曾对于农书的定义,基本以农桑为中心。《述古堂书目》农家类所收农书中,除了《吴社编》与《求雨止雨节解》主要讲述的是仪式活动而非农事活动以外,其余著作的内容皆以讲述衣食原料、大田生产为主。述及草木禽鱼的撰述悉数隔除在农家之外,而别录于“花木”(如《芍药谱》《荔枝通谱》)及“鸟兽”(如《禽经》《耕牛录》《养鱼经》)之列。这种“从严”著录农家著作的知识分类形态,在另一清初藏书家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中亦有所体现。该书农家类收《齐民要术》《农桑通诀》《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甘薯疏》《芜菁疏》《致富奇书》《西北治田说》《齐氏要术》共9部著作,皆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与花木相关的撰述(如《群芳谱》)则见于子部水字上格类家,述及养生的撰述(如《养生类纂》)别录于致字四格道家^①。

通过检阅诸家书目,可发现清人的农书观较前朝有所收缩,清代知识分子对于农书范围的界定较为统一,“农家”类目下均仅收录与农桑生产直接相关的著述。例如成书于康熙十八年(1680)之后的《千顷堂书目》,其撰者黄虞稷虽亦是明遗民藏书家,但其“农家”收书范围却与《绛云楼书目》大不相同(表3)。

表3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农家”所收书籍^②

便民图纂	田家月令	农说	泽谷阅古农书	齐民要书
稻品	芋经	蚕经	树艺考	宝坻劝农书
四时种植书	吕氏农书音释	农政全书	农遗杂书	宜垦令
泰西水法	救荒本草	野菜谱	茹草编	种树书
学圃集疏	治圃须知	芋记	臞仙神隐书	多能鄙事
水云录	三事溯真	教灌园史	备荒农遗集疏	四季须知

相较而言,《千顷堂书目》中所呈现的农书观收缩了许多,黄氏将“农家”的收录标准严格地限定在以衣食原料为原则、以大田生产种植为中心的范围之内。该书目亦仅收录《农圃四书》中的《稻品》与《蚕经》,而将其余两部《种鱼经》《艺菊书》排除在外。花茶果禽类的著作皆未归入农家之列,如《牡丹谱》《荔枝谱》《酒谱》《茶谱》见于食货类,《花谱》《果谱》《相马经》《相牛经》见于类书类,《农舍四时杂抄》《岁时种植》《四季须知》等代表“王官之时”的著述悉数归于时令类^③。

相较于前朝史志书目,清代官修目录中对于农书范围的界定亦有所收缩。《四库全书总目》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其编纂者认为:“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未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鸞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穷,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④可见在清人看来,历代史志目录的著录体例均不够完备,诸如谱、录、经凡与农桑无关者皆不宜归入农家,而应当将此类“辗转旁牵”的撰述悉数移入谱录类。于是,《四库》编纂者在整理农家著作时,开篇即对农书的范围进行了限定:

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因耕而及相牛经,因相牛经及相马经、相鹤经、鹰经、蟹录,至于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谷而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枝谱至于梅谱、菊谱。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于蔬食谱,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而入矣。触类蔓延,将因四民月令而及算数天文,因田家五行而及风角鸟占,因救荒本草而及素问灵枢乎。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茶事一类,与农家稍近,然龙团

① [清]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不分卷,子部露字二格农家类,清道光八年味经书屋抄本,国家图书馆藏。

②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1、332页。

③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第251、402、406、248页。

④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第981页。

凤饼之制,银匙玉碗之华,终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类,明不以本先末也。^①

《四库》中所见农书观尤为窄小,其农家类目仅纳录与耕种、五谷、蚕桑直接相关的农事书。此外,清代官方还十分重视救荒、水利方面的农政书,但即便是加上农政方面的书籍,《四库》农家类所收农书亦寥寥不足20本。现将农家书目臚列于下(表4):

表4 《四库全书总目》“农家类”所收农书表

齐民要术10卷	农书三卷附蚕书1卷	农桑辑要7卷	农桑衣食撮要2卷
农书22卷	救荒本草2卷	农政全书60卷	泰西水法6卷
野菜博录4卷	钦定授时通考78卷	耒耜经1卷	耕织图诗
经世民事录12卷	野菜谱1卷	农说1卷	别本农政全书46卷
沈氏农书1卷	梭山农谱1卷	幽风广义3卷	

以上可见,《野菜博录》《野菜谱》并未进入谱录类而纳入农家,说明编纂者将其与《救荒本草》同视为荒政方面的著述。而救荒、水利方面的著述在《四库》农家类目中所占比例很大,除《野菜博录》《经世民事录》《救荒本草》《野菜谱》《泰西水法》这5本专门述及救荒、水利的书籍以外,其所收《授时通考》《农政全书》《别本农政全书》这3本书籍亦有较大篇幅述及此方面的内容,这些书籍相加起来,竟在《四库》农家类目中占了42%。如此大规模地让救荒、水利方面书籍进入农家的做法,在史志目录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外,在清代另一部官修史志目录《明史·艺文志》中,亦体现出了清代官方对于农书的狭隘看法。其农家类目所著录书籍,除《群芳谱》的内容涉及观赏性植物以外,皆与大田作物种植相关。撰者仅收录《农圃四书》中的《稻品》《蚕经》而将《种鱼经》《艺菊书》排除在外的做法,足可证明官方界定农家时的态度。但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批《明志》“所摭拾既多挂漏,又往往不载卷数及撰人姓名”,而现代学人也普遍视《千顷堂书目》为有明一代艺文目录的标杆,故本文暂不对该书作过多讨论^②。

至清代中后期,诸藏书家在农家类目的收书范围上似已达成著录“从严”的基本共识,即在农家类目下仅收录与农桑生产直接相关的书籍,而以花、茶、鱼、禽为主要内容以及以谱、录、经为主要形式的撰述则被逐类排除在农书的范畴之外。如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农家类仅录《农书》《野菜谱》《泰西水法》《野菜博录》,将草木鸟兽虫鱼等撰述别录于谱录类^③;瞿绍基《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农家类仅收录《齐民要术》与《农桑撮要》,卷十六子部四谱录类有食谱《茶录》《酒经》《蔬食谱》等,草木虫鱼类有《洛阳花木记》《桐谱》《金章兰谱》《蟹略》^④;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农家有《齐民要术》、《蚕书》、陈敷《农书》与王祯《农书》,卷五十三子部谱录类一有《茶经》《茶录》《酒经》《酒谱》,卷五十四子部谱录类二有《扬州芍药谱》《梅谱》《菊谱》《荔枝谱》《竹谱》《菌谱》《蟹谱》等^⑤。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压力而大力倡导扩大蚕丝出口,为普及有关蚕桑的知识,一些官员开始印刻散发蚕桑著作,蚕桑专书一度成为农家类目中较为重要的部分。如张之洞《书目答问》收录《橡茧图书》《樗茧谱》^⑥,又如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收录《桑志》《种桑说》《蚕桑说》《湖蚕述》《广蚕桑说辑补》《蚕桑萃编》等^⑦。

①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二》,第852页。

② 参见张固也、贺洪斌:《〈千顷堂书目〉误收唐人著述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4期。

③ [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40卷,卷16子部4农家类、卷18子部9上谱录类,清光绪刻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

④ [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24卷,卷14子部2农家类、卷16子部4谱录类,清光绪常熟瞿氏家塾刻本。

⑤ [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120卷,卷42子部农家、卷53子部谱录类1、卷54子部谱录类2,清光绪八年归安陆氏十万卷楼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⑥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不分卷,子部农家,清光绪二年贵阳刻本,天津图书馆藏。

⑦ [清]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20卷,卷10子部农家类,民国十二年,浙江钱塘丁氏铅印本,辽宁大学图书馆藏。

总之,通过考察清代官私书目可以发现,清人的农书观念呈不断萎缩的趋势。明清易代之际,受明代文风的影响,在明遗民藏书家所编写的书目中,“农家”的收录标准尚存在较为宽泛的情况。至清中后期,官私书目中已全然不见较为宽泛的农书观念,农家类目下仅收录与“农桑”二字紧密相关的书籍,诸家书目的著录标准均有明显的收缩,大致以衣食原料为原则,以大田生产为中心。

二、农书观念收缩的动因分析

清代以前,古人对于农书范围的界定始终处于一种较为宽泛的认识之中。在史志书目中,自《汉志》至《宋志》,农家的著录标准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宋元以后,私修书目中所呈现出来的农书观念亦在不断扩大。邱志诚对宋代的官私书目进行了考察,指出“从总的趋势上说,宋代农学义域、农书范围在不断扩大”,他进一步考察了元初《文献通考》以及元修《宋史》,认为元代农书观的拓展“实乃宋代农学义域、农书范围扩大之余绪”^①。据葛小寒考证,明人的农书观念亦颇为宽泛。明代知识分子对于农书范围的认识,并不局限于与农桑生产直接相关的“农事书”的范畴,亦包涵了记载花茶圃艺、畜养食品的“农艺书”,以及与水利、荒政相关的“农政书”^②。垂至清代,无论是着眼于官修书目还是私修书目,其中所收录的农书内容所涉范围均明显收缩。那么,清代农书观从风雅飘逸向严格实用极力收缩,其背后有何推力?

首先,经世实学思潮的发展,致使清人的农书观向实用性收缩。明清之际是经世实学思潮勃兴发展的时期,彼时的知识分子在历经了明王朝覆灭和清贵族入主中原之后,掀起了一股反思既往、面向现实的社会思潮。明清鼎革,大部分士人在怀念和隐痛之余转而反思前朝灭亡原因,他们将奢靡颓败的世风视为王朝覆灭的罪魁祸首。于是,这些士人纷纷逃隐于乡间,以务农为“治生”之手段,他们将明末城市繁华生活视作“淫靡之事,出以风韵。习俗之恶,愈出愈奇”^③,而力田勤耕的生活方式成为明遗民维系淳朴治道的归所。据陈鼓应等学者考证,“明清实学思潮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所谓‘崇实黜虚’,就是鄙弃理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而在一切社会文化领域提倡‘崇实’”^④,而清初知识分子即将从事农业生产视为治生之实务。例如《补农书》撰者张履祥曾感叹时人轻农的世风:“自古人士,未有读书而不能耕者。唐宋而降,学者崇于浮,力田之业遂以目之农夫细民之所为,士君子罕顾而问焉。然未至以耕为耻如本朝之甚者也。”^⑤张氏认为“治生以稼穡为先,舍稼穡无何为治生者”^⑥,并且,他进而将稼穡所涉猎的内容限定在“农桑”二字上,指出“治生以农桑为本”,故而张氏在其所撰写的《补农书》中尤为关注水稻生产与栽桑养蚕技术。至清中期,实学思潮仍对农书创作的内容取向发挥着作用。《鬲风广义》撰者杨岫认为以往的知识分子多“切于功名之大成,专心时艺,而忽于耕桑之本务。多弃农书,鄙致富而轻积贮,舍实事而好虚文。”^⑦《西吴蚕略》撰者称赞《蚕桑乐府》“摹写湖蚕始末,尽能极妍,无一字涉虚……”^⑧《四库总目》的编写者亦在“重农贵粟”的基础上进而指出农家之事应注重实用,譬如“茶事一类,与农家稍近,然龙团凤饼之制,银匙玉碗之华,终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类,明不以本先末也。”^⑨故而《四

① 邱志诚:《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及其传播方式》,《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葛小寒:《明代的多元农书观》,《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③ [明]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岳麓书社,2016年,第73页。

④ 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全三卷),齐鲁书社,1989年,“导论”第1页。

⑤ [清]张履祥,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22年,第587页。

⑥ [清]张履祥,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第994页。

⑦ [清]杨岫:《鬲风广义》,郑辟疆、郑宗元校勘,农业出版社,“凡例”第1页。

⑧ 高国金:《中国古蚕书序跋集录》,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第9页。

⑨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二》,第852页。

库总目》农家类目秉持“惟存本业”的原则,将收录标准严格收缩,仅收录与“耕织”内容相关的著述,将其余内容“逐类汰除”。推而论之,在清初“崇实黜虚”的时代精神的引导下,书目撰写者未将观赏性、休闲性等不切实用的谱录类撰著收入农家类目,实质上是出于检讨晚明士风的考虑。黄虞稷等人作为鼎革之际的遗民代表,展露出了这一时期士人心态的激荡转变,他们“对亲近农事的有意强调不是一种纯粹囿于个人际遇的某种舆论或情感宣泄,似更应该看作是士人群体修复基层破败之社会的一种行动宣示”^①。在此社会语境下,清初书目撰者支持一种切为实用的农书著录标准,骤然缩窄了自宋以来不断扩大的农书观,仅将与衣食原料以及与大田生产相关的书籍纳入农家的范畴,可视为社会思潮转变过程中“崇实黜虚”的士人风格的展露,亦不失为一种剔除前朝习气的自觉行动。

其次,清代人口激增所带来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推动了农书写作所涉内容向精细化、专业化收缩。入清以来,经由顺、康、雍三朝九十余年的和平发展,至乾隆六年(1741),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一亿大关^②,荒地开垦“亦不过增一倍而止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③生活于乾隆年间的杨岫认为:“秦人知农弃桑,衣源未开,利缺其半。况今升平日久,生齿益繁,仍守一耕,治生无增,岁计无加,诸凡之费,皆取给于此,所以衣食两艰,丰凶并困。”^④由于蚕丝利润颇为可观,“岁取丝三、五斤,便能完通省赋税有余。况水丝一斤,货银一两四、五钱,能买棉花二十余斤,足中人阖家一岁之衣。若能取丝百余斤,即可为中人之富矣,焉有饥寒之苦,流亡之患。”^⑤面对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社会现实,为解决最为根本的衣食问题,杨氏的农书观极力向“耕桑”二字收缩,“天生蒸民,畀之食以养之,畀之衣以被之。盖食出于耕,衣出于桑,二者生民之命,教化之原,缺一不可者也。”^⑥在清人新撰农书中,诸此强调耕桑并重的论断随处可见,如“夫衣食操生人之命,一岁不耕不织受之饥寒,山农播种之书盖可忽哉……此农之所以重也,而蚕事与农并重。”^⑦又如“农桑者,衣食之大本,凡五谷之地,无不宜桑,无不宜蚕……”^⑧可见,在经世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清人新撰农书所涉内容极力向能够切实解决衣食问题的耕桑知识收缩,这种以农桑为本务的农书观进而影响了私藏书目的著录标准。例如瞿绍基《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农家类仅收录《齐民要术》与《农桑撮要》;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亦只将《齐民要术》、《蚕书》、陈敷《农书》与王祯《农书》看作农书。鸦片战争以后,蚕丝出口成为清政府减少对外贸易逆差的有效对策。种桑养蚕利润颇为丰厚,蚕桑业作为经国济民之利器,其地位进一步提升。例如“朝廷以和议成,力求变法,以图自强……中国出口之货,以茶、丝为大宗。近年以来,茶业败而丝亦因之。”^⑨又如“日本整顿蚕务不过数年而兴旺如此之速者,因仿用西国查得天然利益之法耳。地之所产各物不能仅恃天时之相宜,天时固为要事,而格致家所查新理尤为至要,各国产出之货物其盛与否,亦视其国之人知用格致家查得之新理与否也。”^⑩在此背景下,清人的农书观进一步收缩,知识分子将桑蚕知识作为农书撰写的主要内容。清代后期,专讲蚕桑的农书数量激增,多达百余部^⑪。故而张之洞《书目答问》仅将《橡茧图书》

①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 :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69页。

② 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③ [清]洪亮吉:《卷施阁集》41卷,卷1治平篇,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

④ [清]杨岫,郑辟疆、郑宗元校勘:《幽风广义》,农业出版社,1962年,“谨为敬”第6页。

⑤ [清]杨岫,郑辟疆、郑宗元校勘:《幽风广义》,“凡例”第1页。

⑥ [清]杨岫,郑辟疆、郑宗元校勘:《幽风广义》,“弁言”第1页。

⑦ [清]郑之侨:《农桑易知录》3卷,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⑧ [清]沈练著,仲昂庭辑补,郑辟疆、郑宗元校注:《广蚕桑说辑补》,农业出版社,1960年,“辑补序”第1页。

⑨ 高国金:《中国古蚕书序跋集录》,第203页。

⑩ [清]卫杰:《蚕桑萃编》15卷,卷15外记,光绪二十五年浙江书局刻本。

⑪ 夏如兵、童肖:《中国古代蚕桑业的时代变迁——以蚕书为视角》,《昆明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樵茧谱》收入农家,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中则大量收录《桑志》《种桑说》《蚕桑说》《湖蚕述》《广蚕桑说辑补》《蚕桑萃编》等蚕桑专书。

再者,清帝王为应对“正统性”挑战而强调“农事”的重要性,并尤为推崇一种有别于晚明的崇俭抑奢的生活态度与行事风格,这亦是清代农书观向实用性、质朴性收缩的原因之一。在清廷建立之初,帝国统治者亟需为取代明朝政权而建立合法性地位寻求舆论资源。如康熙南巡时对于江南繁盛景象的评价:“觉有生平景象,然徒事纷奢,罔知务本,未若东北风俗之朴实耳。”^①在其所撰《农桑论》中,亦能看出康熙对于质朴生活的推崇以及对耕桑内容的重视:“使天下之民咸知贵五谷,尊布帛,服勤戒奢……”^②乾隆帝亦曾表示:“凡兹士庶,更宜各敦本业,力屏浮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时时思物力之艰难,事事惟侈靡之是戒。”^③由此可见,清代官修书目农家类目汰除浮华、唯存本业的著录原则,便是在清帝王抑奢崇俭的奢俭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二,清朝定鼎以后,在完成天下一统局面的设计中,不仅要实现疆域空间统一,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政策上改变“南宋—晚明”史观,以应对“正统性”挑战。故而,清统治者尤为推崇汉唐正统观,“因为汉唐时代‘诸夏’与‘夷狄’的种族界线恰恰不如宋朝以后被界定得那样黑白分明。”^④而对于“农事”概念的再阐释,亦成为建构自身正统的重要举措,因为“以诸河流域为代表的华夏农耕和以北部草原为代表的牧业形成了最为突出的夷夏格局;长期以来,这种格局被华夏一方描述为‘以农为本、非农即荒’的文化景象,从而导致视牧为‘蛮’‘落后’‘异端’的社会记忆。”^⑤为避免被视为“蛮夷”“落后”“异端”,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清统治者不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还尤为强调“农事”的质朴性,以此来突显出一种较前朝更为尊崇汉族文化传统的姿态。因而从清代官方书目中可见,清官方排斥前朝较为宽泛的农书观念,而尤为强调农书内容方面的专业化与实用性,此举可视为向汉唐时农书观念的回归。因此,清帝王对于质朴生活的强调以及官方农书观向《汉志》的靠拢,皆可视为一种以文化合法性祛除明末奢靡风气的政治行为。为了彰显对于农业的重视,并出于治国有方的自豪感,清人在官修书目中将花茶谱录等休闲性、观赏性内容移除农家的质朴认识,可以理解为清帝王自觉区别于前朝的思想行动。

总之,在清人的农书观念里,那些被前朝视为农书的花茶谱录等撰述,均被看作是浮华逸事而排除于农书之列。清人的农书观在实学思想、人口压力、经济效益、华夷观念的影响下,从风雅飘逸向严格实用极力收缩,无论是清人的书目或是新撰农书中,皆认为农书所涉内容应以作为衣食原料来源的农桑知识为核心,并尤为强调农业知识的实用性。

三、具体“语境”中的农书

自《汉志》设农家专目以来,历代史志目录中所反映出来的农学观念皆不尽相同,那么,究竟哪些著作的内容是与农相关的,农的范围又该如何划定? 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今人对于农的定义,不一定就能够与古代农的范畴相重合;二是即便是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人对于农的看法亦不见得一致。例如,今人王毓瑚先生所收录的与家畜外形相关的撰述^⑥,在宋人陈振孙看来却与农相去甚远,他说:“及相牛

① [清]玄烨:《康熙帝御制文集》(全四册),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319页。

② [清]玄烨:《康熙帝御制文集》(全四册),第293页。

③ [清]稽璜纂:《皇朝文献通考》300卷,卷39国用考一,光绪八年浙江书局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④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 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11页。

⑤ 陈勤建:《牧耕交映:从文明的视野看夷夏》,《思想战线》2010年第2期。

⑥ 参阅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第317页。

马诸书,是犹薄有关于农者,至于钱谱、相贝、鹰鹤之属,于农何与焉?”^①再如,王氏书录中不予纳录的“农业经济”“农业政策”等方面的书籍^②,在同时代张芳和王思明编著的书录里均予以纳录^③。就此问题,惠富平指出:“由于审视角度之不同,人们对农书的称谓不尽一致。考察这些称谓形成的历史,似乎早期多称农家书,中期称农事书,晚近称古农学书,反映出对农书认识的逐渐深化。”^④既然“农”的概念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那么要如何对农书进行定义呢?

既然今人对农书的看法未必等同于古人,在考察清人农书观时就理应在农书创作的具体语境中进行讨论。就此问题,已有学者从“观念史”的角度出发对宋、明两代农书观进行了探讨。其一,邱志诚在宋代农书收录范围的问题上持较为保守的态度。他主要是通过检视宋代史志、目录中“农家类”的收书情况,建议依照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收录农书的标准,认为农书范围应“以讲述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技术直接相关的知识的著作为限”^⑤,而《书录》所排除的一些谱录(如《茶录》)、荒政类撰述(如《救荒活民书》),凡涉及生产技术的,亦应予以纳录,除此以外的通论性撰述及农政书则不予收录^⑥。其二,葛小寒认为应遵从“广义”的农书概念。他从受众群体的角度出发,指出明人的农书观是多元的,读者身份的分野(包括农民、士人与官员)会导致其在农书认识上的差异。因此,葛小寒综合社会各阶层对于农书的认识,认为农书范围应涵盖面向农民的“日用技术性”的农事类著述、面向士人的“休闲性”的农艺类著述以及面向官员的“事功教化性”的农政类著述^⑦。邱志诚与葛小寒的分歧点在于,那些无法直接参与指导农业生产的撰述(如花、茶谱录与农政书)能否纳入农书之列。就清代农书而言,葛小寒与邱志诚均将花茶谱录类撰述纳入农书范围的收录标准明显过宽,而邱志诚不予收录通论性农书的标准又略狭隘。笔者认为,葛小寒将“观念史”引入农书研究的做法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尝试,即要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检视时人的农书观念。因此,本文对于清代农书观的探讨即是在具体“语境”中展开的。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22卷,卷10农家类,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同治十三年江西书局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② 在王毓瑚看来,“其属于农业经济和农业政策性质的专书,如泛言重农以及田制、荒政等等为对象者,一概不收。”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凡例”,第1页。

③ 张芳和王思明认为,“凡记述中国人民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所积累的农业知识理论、生产技术经验、农业经营管理及对农业文献的考证校注等方面典籍,均在本目录收集之列”。张芳、王思明主编:《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编辑说明”第1页。

④ 惠富平、牛文智:《中国农书概况》,西安地图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⑤ 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凡例”第1页。

⑥ 邱志诚:《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及其传播方式》,《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⑦ 葛小寒:《明代的多元农书观》,《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